

中山文化教育館
刊

春季號

1936



中山文化教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館藏書章

季刊

號季春

投稿簡章

一、本刊徵求下列著作：

子、關於三民主義之社會學的、經濟學的、政治學的及哲學的研究。

丑、關於建國大綱、實業計劃及關於本黨一切政綱之理論與實際的研究。

寅、關於中國民族史之研究。

卯、關於中國各地民族狀況的調查與研究。

辰、關於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等歷史及現狀的研究。

巳、關於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介紹與批評。

午、關於各國革命史的研究。

未、關於各國社會政治經濟歷史及現狀的研究。

申、關於各弱小民族現狀的研究。

酉、關於一般的哲學、教育、藝術種種文化問題之理論的研究。

二、來稿須繕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人名地名線均加在左邊，註文寫在每頁末。）若有圖表，須用墨筆繪成，以便製版。

三、來稿以一萬字為度。（特約者另定。）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者請於投稿時附加聲明。

五、來稿登載與否，除預為聲明附足郵票者外，概不退還。

六、來稿經揭載後，本刊當酌奉稿費，每千字由五元至廿元。

七、來稿酬額由本刊酌定，不預先函商，若著者須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預先聲明。

八、來稿經登載後，其版權為本刊所有。

中山文化教育館李刊編輯委員會敬訂

不許轉載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春季號

編行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

南京總理陵園體育場路

發行處 中山文化教育館出版物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總代售處 生活書店

南京八條巷十四號

印刷者 文心印刷社

每季一冊 全年四冊

定價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零 六角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預定不 四 二元 一元二角 三角

本國郵票 郵票一 者為限。（外國

等 半面

特 元 四十元

優等 元 三十五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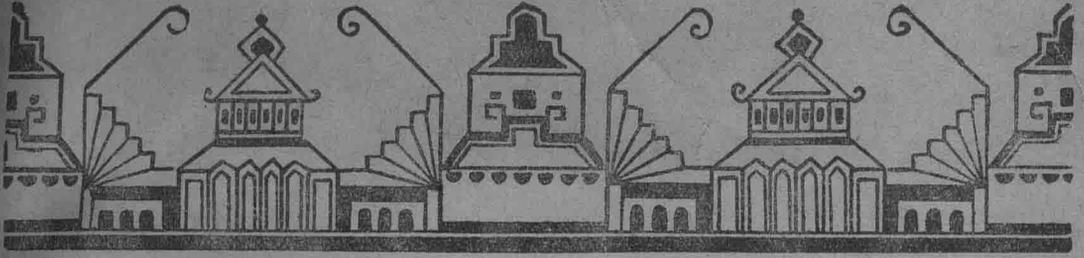
上等 元 三十元

普通 元 二十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及繪畫刻圖，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詳細廣告定章，函索即寄。

每期廣告價目表

普通 正 文 後 五十元 二十八元



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

春季號
目次

三民主義教育的相對性與統一性 姜琦 (一)

中國憲政史及最近憲法草案的精神 儲玉坤 (二五)

中國歷代地方行政制度之沿革及其當前問題之商榷 趙連福 (五)

物產證券與土地村有之檢討 林驥材 (六七)

如何解決各省耕地之地租問題 陳正謨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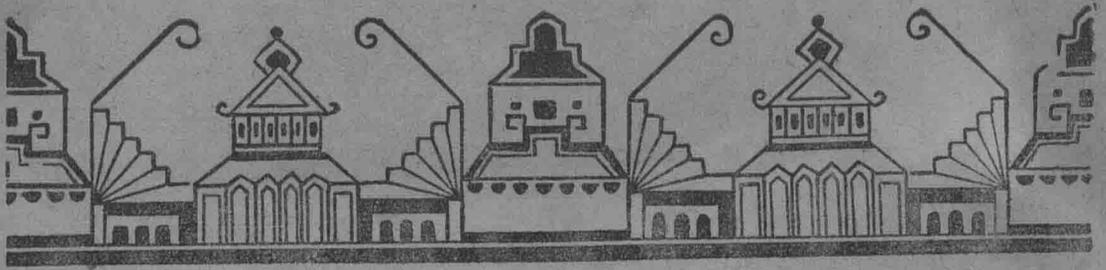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下半期的中國經濟 瑞 (一〇九)

中國貨幣制度的評價 (三一)

戰國時期軍事之研究 (一四五)

太平天國革命前夕的土地問題 王瑛 (一六七)

鴉片戰爭後的國民民生計問題 千家駒 (一七)



國際貨幣戰與中國幣制改革……………錢俊瑞(二〇九)

世界經濟危機與殖民地經濟……………王德昭(三二一)

現階段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與民族解放運動……………吳清友(三三九)

佛教入中國後之變遷及其特質……………姚寶賢(二六七)

最近法國的社會學……………劉真如(二七三)

邏輯的根本原理……………李達(二八三)

熱力學法則及其所導出的宇宙觀之哲學的批判……………王特夫(三〇九)

物質底存在問題……………葉青(三一九)

居友的藝術觀……………侍桁(三七七)

名 現代民族主義演進史……………黃嘉德(三五二)

著 政治經濟學史……………張仲實(三五六)

介 現代資本主義……………季子(三五九)

紹 勃瓦樓的詩學……………魏一參(三六三)

時事類編

第四卷 第一期 目錄

民國廿五年一月一日出版

時論撮要

國聯·意大利及將來……梅汝璈
 意大利的軍事危機……袁道豐
 意當前的意大利……袁道豐
 危望與回顧……袁道豐
 果有一戰時景氣一耶？……李景必
 英國新幣與國際形勢……高璉度
 中國選舉與國際形勢……高璉度
 這次選舉與國際形勢……高璉度
 地中海的海軍組織……李萬居
 袁道豐
 美國復興與憲政改革……陳石孚
 「賴伐爾試驗」的失敗……潘蕙田
 被攻擊的法蘭西銀行……潘蕙田
 比利時的經濟現狀……李萬居
 菲律賓的前途……高璉度
 德國如何統制輸入？……李景必
 美蘇兩國的比較……高璉度
 美國問題……高璉度
 美國政治家……高璉度
 西北殖邊的可能性……惠期
 陳石孚
 梅汝璈

國際時事漫畫(二十九幅)

世界論壇

意軍侵阿之真義……西蒙 譯著
 國聯的和平工作……蕭威爾 譯著
 倫敦軍縮會議之展望……石丸藤太 譯著
 中國幣制改革與列強爭霸戰……田中忠夫 譯著
 不滿意的國家與世界的資源……伯克斯頓 譯著
 蘇聯國防的實力……崔宗填 譯著
 法國經濟狀況……山下林造 譯著
 悠久的尼羅河……卡爾 譯著
 阿比西尼亞論……李萬居 譯著
 李景必 譯著
 克格赫爾特 譯著
 李景必 譯著
 潘蕙田 譯著

學術論著

神祕的宇宙……蘇林凡 譯著
 中間階級的危機……劉易斯何雷著
 計劃經濟的理論與實驗……莊幹之 譯著
 阿伐利 譯著

科學新聞 (四則)

人物評傳
 美軍主帥潘興將軍傳……富雷德立克鮑馬著
 良純合 譯著

文藝

論現代小說……烏爾夫女士著
 馬克吐溫日記抄……馬克吐溫著
 傅尙果 譯著
 黑影……冰比 譯著

文壇消息 (五則)

新書介紹……王文山 輯

總發行處 中山文化教育館出版發行處 定價 全年 廿一元 半年 十一元 三月 六元 二月 三元 一月 二元 角

三民主義教育的相對性與統一性

姜琦

我曾經在本刊第二卷第四期裏面發表過三民主義之辯證

觀一文，那一篇文字是我站在辯證法的立場去研究三民主義本身現在呢，我欲要採用同一的觀點——辯證觀——來研究三民主義的教育。本文所以命名為「三民主義教育的相對性與統一性」就是三民主義的教育之辯證觀。這兩篇文字可算是姊妹篇，因此，前文既蒙本刊代為發表，那麼，本文也不得不借重本刊的篇幅把牠發表一下，以就正於教育界同志們。

在我未說明三民主義教育之性質以前，這裏有一個先決的前提不可不先用極簡單的話把牠解決一下。這就是要問中國的教育是不是三民主義的教育。我的極簡單的答案，就是說中國——至少目前的中國——的教育是必然地要根據三民主義去建設而稱之為「三民主義的教育」。我所持的理由，是曾經發表在拙作教育哲學（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出版）一書及中國教育需要那一種哲學（見商務教育雜誌新四號）與三民主義教育之本質的探究（見正中教育學刊）兩篇文字裏面，此地無須復述。現在我就直截

了當地去研究三民主義的教育之性質。

然則三民主義的教育之性質究竟怎樣呢？原來這個問題是很容易地解決的。因為三民主義本身是什麼樣的，那麼，三民主義的教育之性質也是什麼樣的緣故。如果我在前文對於三民主義本身所解釋的話是對的，那麼，三民主義的教育之性質，如同三民主義本身所具有的性質一樣，也是辯證的，尤其孫中山先生自己所有的「實踐的民生的辯證法」。（關於所謂「實踐的民生的辯證法」這個名稱，是我所命名的，牠的說明，除掉本文的後面稍加解釋外，我曾經在拙作教育哲學後序二及其他文字裏面屢次地說過了，此地無須復述。）現在我祇要採取一貫的主張，去應用與研究三民主義本身所應用的觀點——辯證觀——再來研究三民主義的教育之性質，並指出牠所具有的「相對性」與「統一性」。

但是三民主義教育的範圍很廣，那麼，我究竟從什麼說起而說到那裏止呢？現在我為謀說明便利起見，不妨就仿照拙作教育哲學裏面所提出的幾項：（一）教育本質論，（二）教育目的論，（三）

教育方法論，(四)教育價值論去說明。同時，本文所欲要說明的，仍是要採用那部書的主張，不過，其中有許多是我臨時所想到而拿來補充的，也有些是對於從前的意見加以修正的而已。

第一，就教育的本質而論，牠又可以分做教育的本質，牠本身教育的必要與教育的意義三個問題，分述於後：

(一)教育的本質，牠本身是辯證的。具體地說，教育的本質裏面最初就包含着「非本質」的東西在內。德波林(Deborin)說：「本質裏面是包含着『非本質』的東西，而且還包含着這個東西與其他底關聯，即內的聯絡。」(見德波林著，任白戈譯，伊里奇底辯證

法二九頁)黑格爾(Hegel)也曾經這樣地說過：「離開牠的本質和法則而來觀察的假象，便是構成我們所認為『非本質』的東西。」照德波林與黑格爾二人的這些話看來，就可知教育的本質，也是這樣的；具體地說，教育的本質，一定是與「非本質」的東西互相對立着的而又互相消解的。

教育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我認為牠就是「民生」。如果這樣，那麼，與教育的本質相對立着的「非本質」的東西，豈不就是「非民生」嗎？不錯，牠是「非民生」。如果我們欲明白「民生」與「非民生」有什麼區別，那麼，我們不可不先說明「民生」與「非民生」之意義與內容。什麼是民生？據孫中山先生自己的解釋，所謂「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

的生命。」至於牠的內容呢，據孫先生的意思，牠不外乎是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合「民生」的意義與內容而論，所謂「民生」實在就是經濟生活。這樣，那麼，所謂「非民生」就是「非經濟生活」的意思，因為所謂「非民生」就是「非經濟生活」，所以牠的內容就不是衣、食、住、行四大需要，而是與這四大需要相對立的東西。這是什麼樣的一種東西呢？我可答解一句：這就是所謂「禮、義、廉、恥」。

如上所述，就可知「民生」與「非民生」之對立，就是「衣、食、住、行」與「禮、義、廉、恥」之對立。自有人類以來，衣、食、住、行與禮、義、廉、恥雖是互相對立着，然而這兩者是始終地互相綜合着的。在原始時代，當時的人類雖然沒有所謂「禮、義、廉、恥」等等的德目，然而人類的生活上所需要的衣、食、住、行裏面最初包含着禮、義、廉、恥四種要素。具體地說，譬如原人需求衣、食、住、行的時候，祇有各用自己的力氣與天然鬥爭而沒有與同類的攘奪。這種事實，若拿動物中的獸類或鳥類的生活來觀察一下，就可以證明的。再就衣、食、住、行牠本身而論，固然牠的功用是在於求煖、求飽、求安、去便，然而牠未嘗不是為禮、為義、為廉、為恥而要求的。具體地說，譬如原人的衣，最初先從身體的下部蓋起，其餘部分不妨裸露，又如他們的巢屋，多少也是與性的問題有關的；其餘食、行兩項若是仔細地研究起來，也不難找到同樣的結論。牠不是與禮、義有關，就是與廉、恥相

涉總括一句話衣食住行四大需要裏面最初就包含着禮義廉恥四種要素。這是自然而然地這樣的，用不着什麼人工去造成牠，所以當時就無所謂禮、義、廉、恥等等的德目，祇用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來表示他們的生活就夠足了。

然而後來到了文明的時代，當時的情形，就大大不相同的。具體地說，衣食住行與禮、義、廉、恥兩者開始地分離絕緣；換句話說，禮、義、廉、恥是由衣食住行裏面派生出來而成為一個獨立的東西。這樣，那麼，需求衣食住行者走一條路，講究禮、義、廉、恥者又走另一條路，各行其是，不相為謀了。原來一切事物的對立本屬無妨的，積極地說，却是必需的；祇要真能夠互相綜合就滿足了。然而人類自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迄於今日，衣食住行與禮、義、廉、恥始終地互相對立着而毫無有什麼綜合之表現。這種現象的原因若是說起來，那非隻言片語所能夠盡，祇好簡單地說一句，這是社會組織與社會的本質不相調和，彼此發生衝突的一件事，有以使然的。因為這兩者那樣地互相對立着，甚至極端地各趨於極端，所以社會現象越弄越紛糾，有時竟釀成一種極其不安靜的狀態。

但是從來很有許多人要出來挽救這種惡劣的社會現象，他們並且知道衣食住行與禮、義、廉、恥這樣地對峙下去，終非正當之道。所以他們一方面提倡禮、義、廉、恥的道德，他方面又講求衣食住行的需要。例如孟子就是其中之一人，孟子有時很注意於人民的

經濟生活問題，然而在另一方面看來，他還是太偏重於「義」的一極，而太輕視「利」的一極了。然則孟子為什麼會這樣地做呢？這就是因為他私淑孔子的遺教，而墨守孔子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兩句話的緣故。原來所謂「君子」就是貴族，所謂「小人」就是平民；據孔子的意思，前者應該講究禮、義、廉、恥——約言為「義」，後者祇能需求衣食住行——概言為「利」。這無異於柏拉圖（Plato）把人類天來的本性分做三個階級：第一階級是哲人（統治者），可以享受教育；第二階級是軍人（保護統治者），稍受教育；第三階級是工商業者（被統治者），不能享受教育，有的也不過祇限於他們私自學習些寫、讀、算三種，供他們謀生營利而已。由此可見無論孔、孟或柏拉圖的意思，無非就如上面所說，由當時的各該社會組織與社會的本質不相調和，彼此發生衝突的一件事，有以使然的。換句話說，當時的各該社會組織有一種分歧的狀態，所以牠會使孔、孟或柏拉圖發表出那樣的互相對立的話；同時他們又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把「義」與「利」或「哲人教育」與「工商者教育」綜合起來使牠成為有統一性的東西，反而任牠各行其是的。

然而在中國，後來曾經有一位政治家出來要想把「義」與「利」綜合起來而得到一個有比較的統一辦法。這是什麼人呢？他就是為近來提倡或反對新生活運動者所常談的管子。管

子一方面說「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然他方面又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的這兩方面話，就是他會看得到衣、食、住、行與禮、義、廉、恥是社會問題的兩極而以爲兩者不可偏廢的。不但如此，他並且還看得到衣、食、住、行——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或最後的決定要素。怎麼樣說呢？因爲管子的前兩句話裏面所有的「而後」兩字，就是指出衣、食、住、行與禮、義、廉、恥的因果關係。同時，他雖然認定衣、食、住、行——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或最後的決定要素，然而他却認定「民生」裏面最初包含着「非民生」——「非經濟生活」——的禮、義、廉、恥在國家的觀念形態——「非本質」的東西——上却有莫大的效用。因爲如此，所以他又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這樣地用鳥瞰的眼光看破社會現象之全體性，所以近人有稱管子爲中國古代的經濟家或政治家，決非偶然的。最可惜的，管子的這種學說，當時沒有替他發展，幾乎完全被後人埋沒了。

到了現在，自從孫中山先生倡導三民主義以後，管子的學說，纔漸漸爲人所認識。因爲孫先生的學說，也是一方面認定民生——衣、食、住、行——是歷史社會進化的重心，然他方面又認定中國固有的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國家和民族能長久生存的原因。由此，可見孫先生與管子兩人的學說若是互相比較

起來，彼此雖非同一，然而總有些頗相近似的。設使我們僅採取管子的一方面話而遺棄其他一方面話，那麼，就不會被壞孫先生自己的學說一般。因爲如此，所以我們不欲解決目前的中國社會問題則已，如果要解決牠的話，那麼，我們非完全地遵守孫先生自己的學說不可。具體地說，我一方面必須認清「民生」——衣、食、住、行——是歷史社會進化的重心，然他方面又應該重視「非民生」——禮、義、廉、恥——是中華民族的國家能長久的原因。同時，我們還必須把這兩者時時經過「棄揚作用」(Aufheben)——否定之否定——互相綜合起來而進展到較高階段的境域。因爲如此，所以如果我們站在社會的觀念形態上的時候，要提倡「衣、食、住、行」要適合乎禮、義、廉、恥，那麼，在這個時候，我們又必須站在社會的本質上去注意「禮、義、廉、恥」須依存於衣、食、住、行」這一點。反過來說，我們也必須這樣地做法。

以上所述，是我關於「民生」與「非民生」的對立關係及其能夠互相綜合之大略的說明。不過我雖然認定教育的本質是民生，尤其是經濟生活，但是我並非說教育的本質就是衣、食、住、行牠本身，而是說牠是生產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之能力或可能性；因此，我又稱教育的本質就是社會生產力。(請參考教育雜誌新十三號所揭載的教育即社會生產力論一文)我認定教育這種民生，或社會生產力即附麗於衣、食、住、行牠本身的上面而不假外求的而已。同一道理，

現在我既然要認定禮、義、廉、恥是教育的本質裏面所包含着的一「非本質」的東西，換句話說，牠是「民生」尤其是經濟生活裏面所包含着的一「非民生」——「非經濟生活」——，所以我也並非說這種「非民生」或「非經濟生活」的東西就是禮、義、廉、恥牠本身，而是說牠是依存於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之合理的感應或反應。不過，我也認為教育這種合理的感應或反應即附麗於禮、義、廉、恥牠本身的上面而不假外求的而已。設使我們認定教育就是禮、義、廉、恥，那麼，教育這個事象就變成爲「道德」而不是「教育」牠本身了。殊不知在觀念形態上看來，「教育」與「道德」兩者各有各的任務，不可混爲一談的。同樣地，在本質上看來，教育雖然就是民生或經濟生活，然而牠並非就是「經濟」。實在講起來，「教育」與「經濟」兩者各有各的任務，也不可混爲一談的。

教育的本質與「非本質」換句話說「民生」與「非民生」再換句話說，衣、食、住、行與禮、義、廉、恥，既如前面所說，在歷史上看來前者最初本來包含着後者，而且還包含着前者與後者底關聯——即內的聯絡；到了後來，因爲社會組織與教育的本質不相調和彼此發生衝突，所以後者就由前者裏面派生出來與前者脫離關係，使彼此互相對立起來，於是在所謂「教育的本質」之外，又有所謂「教育的變質」或「教育的非本質的東西」這一個概念突然地發現出來，並不像最初祇有一個教育的本質牠本身可

以包含着牠的「非本質」的東西及兩者的關聯一般了。這種現象，是好像最初被包含着於樹木的芽裏面的枝葉與花菓，後來牠逐漸發展，到了一個與樹芽牠本身的溫度不相調和的季節，於是這些枝葉與花菓從固有的樹芽脫離關係，宣告獨立而飄散於四方，假使有人問起牠的根源何在，牠也莫知所答，或者牠以爲牠本身就是根源一樣。然則在現在看來，這樣地由最初的本態而轉變過來的變態；具體地說，由「最初祇有一個教育的本質牠本身可

以包含着牠的非本質的東西」的那種本態而轉變過來的「使教育的本質與牠的非本質的東西顯然地互相對立起來」的這種變態可以永久地繼續下去嗎？我想沒有誰肯許可的。然則我們又將怎樣呢？這也是不待說的，我們應該把教育的本質與牠的「非本質」的東西互相綜合起來，使牠還元於教育的本質。

然而我們須要注意的，上面所說的這樣地綜合之後，使牠還元於教育的本質這一句話，並非說使牠完全地還元於固有的教育的本質，而是說使牠由低階段的教育的本質再進展到較高階段的教育的本質的意思。因爲低階段的或固有的教育的本質裏面最初所包含着的一「非本質」的東西——禮、義、廉、恥——本是很隱約而不能夠辨別的；至於較高階段的或進展以後的教育的本質裏面再度所包含着的一「非本質」的東西——禮、義、廉、恥——呢，牠却是很明顯而且容易捉摸的。因爲前者如彼，所以原始時

代的「教育」(當時本無所謂「教育」,因為當時人類的的生活就是教育的緣故),祇需求衣、食、住、行,那麼,禮、義、廉、恥會自然而然地爲牠所決定了。因爲後者如此,所以今日時代的教育,在需求衣、食、住、行之外,同時還要人工地去講究禮、義、廉、恥。但是我們又須要注意的,我們應該如前面所說,需求衣、食、住、行者與講究禮、義、廉、恥者不可各走相異的兩條路,不相爲謀;而必須都站在同一的一條路上去行走;不過,各個人的出發點不妨相異,具體地說,即前者由這一條路上的一極,而後者由這一條路上的另一極分別地出發,不拘誰走得快或走得慢,一走到這一條路上的任何某一極,這兩者必須謀相綜合,變成爲統一的態度,別不出誰是前者或誰是後者;一句話,大家都是一個社會的人,尤其都是社會上的一個良好的而且有用的公民而已。固然,各個人最初由各別的一極而出發的時候,大家都是無意識,並沒有什麼存心要想走到這一條路的另一極,或者要想走到這一條路上的中途,在牠的任何某一點上與別一個人相對碰而後又相參與,然而他們經過幾次訓練之後,就由無意識轉變到半意識,再由半意識轉變到有意識,久而久之,到了某個時期,各個人一經由各別的一極而出發,那麼,他就有意識地存心要想走到這一條路的另一極;或者要想走到這一條路上的中途,在牠的任何某一點上與別一個人相對碰而後又相參與,由此,可見教育的本質裏面所包含着的「本質」或「非本質」這個東西都祇有發

展的可能性而牠自己沒有實現性或自動發展性。如果我們要使牠實現發展,那麼,非先把牠經過相當的時間與程度的訓練不可;或廣義地說,非把牠經過相當的時間與程度的教育作用不可。不過我們須要注意的,此地所謂教育作用,並非是前面所說的教育的本質牠本身,而是位於教育的本質這個最下層基礎的上面之下層建築——教育的結構。因爲教育的本質牠本身,既如上面所說過的,祇有發展的可能性而沒有牠的實現性或自動發展性,所以教育的結構,那是促成教育的本質去實現發展的一種作用。這如同社會組織尤其是經濟的結構去促成社會的本質——民生或社會生產力——去實現發展一樣。

然而下面所汎言的教育結構,還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如果我們站在具體的方面看來,牠有種種的結構;固然,其中有些教育的結構能夠與教育的本質相適應相調和而可以促成牠去實現發展,毫無窒碍的。然而其中也有些教育的結構却容易與教育的本質相抵觸相衝突,因此,牠不但不能夠促成教育的本質去實現發展,並且反而阻害教育的本質的發展可能性而變成爲教育的本質之桎梏;甚至使教育的本質轉變到教育的變質而成爲無用的東西。這也如同某種社會組織或經濟的結構與社會的本質——民生或社會生產力——相抵觸相衝突,因此,牠不但不能夠促成社會的本質去實現發展,並且反而阻害社會的本質的發展

不可任意地分離割裂的。假使我們把這些教育任意地分離割裂，那麼，我們當實施牠的時候，不啻使衣食住行與禮義廉恥分途進行，各行其是，永無綜合之一日。結果呢，需求衣食住行者祇知道唯利是圖，唯物是感；講究禮義廉恥者祇知道唯道是炫，唯心是迷；因此，我們不是走入歧途，就是陷入虛渺，都不能自拔的。

殊不知在本質上看來，人類的意識固然為存在所決定的，然而牠一經為存在所決定之後，牠一定到了某個時期，往往會反客為主，再轉來支配存在或控制存在。因為如此，孫中山先生說：「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心之為用大矣哉！」況且，如前面所說，「民生」裏面最初就包含着「非民生」的東西，因此，我可以同樣地說「存在」裏面最初就包含着「意識」的種子，不過這種「意識」的種子最初還是渾沌的狀態，等到經過相當次數的刺激作用之後，方纔轉變為明確的狀態而已。現在我們姑不問意識最初是怎樣地發生及其發生後有怎樣的狀態，但是我們祇要去看，在事實上意識與存在是否互相對立着的。如果我們認定意識與存在是無疑地對立着的，那麼，我們又不能不把這兩種互相對立的東西消解起來而求得一個綜合的境域。因為如此，所以三民主義教育的結構不應該偏重於全部的教育過程上的任何一極，而必須把牠的兩極之價值等量齊觀。不過，我們應該在實施教育的時候，視被教育者的智力、學力及努力乃至社會環境的性質、種類

及需要等等之如何，有些時候從這一極出發，有些時候由另一極出發，也有些時候由兩極同時出發；或走得快，或走得慢，抑或快慢步互用，這樣地伸縮自在，變化無窮，那麼，自然而然地會得到效果。新生活運動所以有「因人制宜、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三大原則之規定，就不外乎此。

如上所述，就可知前面所舉的那種種教育都有同等之價值，同時又有各別的職能，所以我們在實施教育的時候，一方面應該把那種種教育謀一個平均調和的發達，然他方面又必須按照那種種教育的性質再去因材施教。這樣，那麼，無論需求衣食住行也好，或講究禮義廉恥也好，庶幾可以收獲效果，進行無礙了。此外，還有所謂「一般教育」或「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與所謂「職業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也是這樣的。(這兩種教育的區分，原來是受了前面所述預拉圖的人性分類法的影響。蘇俄的平克微支(Pinkevitch)說得好：「一般教授的目的與職業陶冶的目的並無衝突……一個人必須受普遍的教育，同時要有一些特別技能。總之，蘇聯的教養與一般教授的目的，在於養成健康、強壯、活潑、勇敢、獨立思考與行動各方面發展的人，他了解全部現代文化，他是無產階級利益——結局為全人類利益——的創造者與戰士。」)(A. P. Pinkevitch, *The New Education in the Soviet Republic*, P. 173) 美國的杜威(Dewey)

也早經有同樣的議論。無論照平克維支氏或杜威的見解看來，就可知「一般教育」與「職業教育」也有同等的價值，同時又有各別的職能；祇看我們怎樣地去應用牠，然後纔知道我們有無表現牠的價值及發揮牠的職能而已。總之，中華民國的教育若是要使牠的本質有迅速與長足的發展，那麼，牠非先有與三民主義教育的結構有關係之種種教育不可。不但如此，並且就一般的情形而論，這種教育應該有平均調和之發達；就特殊的情形而論，這種教育又必須有因材施教之設施；最後還須要把這種教育謀一個有機的關聯去消解教育的本質與「非本質」的東西，換句話說，「民生」與「非民生」，再換句話說，衣、食、住、行與禮、義、廉恥之對立，再謀其所以綜合而表現其統一性。

綜合上面的許多段話而論，就是我關於教育的本質之說明。固然，其中有些地方是越界地涉及教育目的論、教育方法論及教育價值論的問題，然而這是勢所必然的。因為教育的本質，在一方面看來，固是一切教育之根本或最後的決定要素；但是在另一方面看來，如前面所說，牠本身祇有發展的可能性，而沒有牠的實現性；如果要牠實現，又非依靠其他一切教育不可。因為如此，所以無論站在那一方面去研究教育的本質，那麼，不得不涉及其他一切教育問題；同一道理，我在下面討論到其他一切教育問題的時候，也一樣地不再涉及教育的本質問題。但是前面不過稍稍涉

及其他一切教育的名稱而已。至於牠本身的内容問題呢，下面還有詳細的說明之必要。最後還有一點要聲明的，本項的說明，似是與下面將要討論的各項互相比較起來，那麼，牠也許過於詳細；然而這也是迫於不得已的。因為如上面所說，教育的本質是一切教育之根本或最後的決定要素的緣故。設使我們不把教育的本質說明得有相當程度的詳盡，那麼，其他一切教育問題上的有些地方不容易迎刃而解，甚至有些地方又會發生誤解的。

(二)教育的必要牠本身，如同前項教育的本質牠本身一樣，也是辯證的。具體地說，教育的必要裏面最初就包含着「非必要」的東西在內。然則人類為什麼一定需要教育呢？這個問題是與教育的本質有相互關聯的。因為教育的本質，如前面所說，是民生，尤其是經經生活；而經濟生活，又不外乎是衣、食、住、行。如果衣、食、行被認定為人類生活上所必需的，那麼，教育當然也為人類所必需的。杜威在他的著作民主主義與教育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一書裏面，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標題就稱為「教育為生活所必需」。他在牠的内容裏面又說：「教育有關係於社會的生活，如同滋養料於生育之有關係於生物的生活一樣。」杜威的這一句話，並非類比的推論，而是實際地描寫教育與生活之關係。因為他以為教育與生活不能分離，所以牠是為人類所必需的。

以上所述，是關於教育的必要方面之說明。現在我們再來討

論教育的「非必要」問題吧。教育的必要，既然如前面所說，是與「民生」——衣、食、住、行——有關係的。這樣，教育的「非必要」豈不是與「非民生」——禮、義、廉、恥——也有關係嗎？我先答一句：這是有關係的。如果像這樣的答法，那麼，我們就會發生如次的疑問：「難道人類不需要禮、義、廉、恥嗎？」這個疑問，却有如次的解決：原來禮、義、廉、恥牠本身單獨地存在的時候，牠就無所謂「爲人類所必要或不必要」的這句話；等到牠一經與衣、食、住、行發生關係之後，方纔表現「牠爲人類所必要或不必要」的這個問題。因爲在本質上講，禮、義、廉、恥最初本是依存於衣、食、住、行；即使後來由本質的發展關係使禮、義、廉、恥轉變過來再去支配衣、食、住、行——由「民生」的發展關係使「非民生」的東西轉變過來再去支配「民生」——，然而牠總是始終地與人類生活發生關係。因爲如此，所以禮、義、廉、恥也是爲人類所必要的。現在的新生活運動的原理就是根據於此。原來所謂「新生活」本是遵照孫中山先生的遺訓，認定「民生」爲歷史社會進化的重心，以三民主義爲社會組織的範疇所創造之一種新的生活的意思。如果我的見解是對的話，那麼，新生活的本質就是民生。因此，新生活運動所講究的禮、義、廉、恥，也不外乎是依存於「民生」的上面。不過，新生活運動往往因人、因時及因地而制宜，所以祇說「衣、食、住、行要適合乎禮、義、廉、恥」而不談什麼關於「禮、義、廉、恥須依存於衣、食、住、行」這

一類話。這並非提倡新生活運動者不知道這個道理，實在以爲可不必談到這一層。因爲這是自明的道理，好像幾何學上的公理一樣，不待證明而知的緣故。由此，可見新生活運動所以祇說「衣、食、住、行要適合乎禮、義、廉、恥」也不過由人類生活過程上的禮、義、廉、恥這一極先行出發而已。但是牠的歸着點，仍是會到達衣、食、住、行那另一極。總之，無論我們由人類生活過程上的任何一極——衣、食、住、行或禮、義、廉、恥——而出發，這兩極總是有密切的關係；再一句話，禮、義、廉、恥是始終地與「民生」發生關係。因爲如此，所以禮、義、廉、恥也是爲人類所必要的。

照上面的一段話看來，就可知所謂「教育的非必要」並不是在於禮、義、廉、恥牠本身，而是視禮、義、廉、恥有無與「民生」發生關係以爲斷。假定禮、義、廉、恥與教育的本質——民生——相分離，那麼，這種種德目，不啻是一個死符號，沒有什麼價值可言，因此，牠有時不爲人類所必要了。因爲如此，所以我以爲禮、義、廉、恥與衣、食、住、行一定發生相互的關係，才有價值，也才爲人類所必要的。不但如此，牠並且爲全體人類所必要的。因爲設使牠不以全體人類的需要爲前提，那麼，禮、義、廉、恥往往會爲某種特殊的團體或階級所利用，拿牠來做維持這種特殊的團體或階級的利益之工具了。固然，在這種特殊的團體或階級的方面看來，這種種德目也是與牠的各個屬員的生活有發生關係的；但是這祇是與一部分人民

的生活有關，而與全體人類的的生活無涉的；因此，牠祇可以稱為「個人道德」而未會到達「社會道德」的程度。因為這種種德目是這樣地以少數人的利益為前提，而不以全人類的需求為目的，所以牠有時因為某種特殊的團體或階級認做必要的，但是牠有時又為另一種特殊的團體或階級認做不必要的。如果牠是以全人類的需要為目的，那麼，牠是完全地為人類所必要的。由此，可見禮、義、廉、恥的必要或不必要，不但視牠有無與生活發生關係以為斷，並且還隨牠是否以全人類的需求為目的這一點而轉移的。

不但禮、義、廉、恥是這樣的，就是衣、食、住、行也莫不然。原來所謂「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一見就可知牠是為求煖、求飽、求安、求便而設施的，無論在維持個體的生命或繼續種族的生命上看來，牠是為人類所必要的。但是牠也有時成為可要可不要的東西，甚至有時完全地不為人類所必要了。譬如有裨益於衛生、健康之衣服或食物，當然為全人類所必需的；然而那種徒飽眼福或口福之裝飾品或酒食品，却是不必要的東西。即使退一步說，這些東西也是為有些人所必需的；但是這就是因為牠祇是為少數人所必要，被他們當作裝飾品或消閒品——一句話，奢侈品——看待，而不是適合於一般人類的生活之要求；所以在一部分人看來，牠固然是必要的，然在另一部分人看來，牠又是 unnecessary 的，一句話，牠就成為可要可不要的東西。

照上面的幾段話看來，就可知教育的「必要」與「非必要」問題，雖則與「民生」或「非民生」有密接的關係，然而牠並非單祇存在於衣、食、住、行與禮、義、廉、恥本身之上，而是存在於全部的教育事象及其過程裏面。因為教育這個事象裏面是包含着「民生」與「非民生」——衣、食、住、行與禮、義、廉、恥——兩者，並且這兩者都是以全體人類為對象的緣故。再就教育的過程而論，無論在縱的方面講，或在橫的方面講，又是很廣泛的。所以我們若問教育是否必要，那麼，我們應該要認清教育牠本身究竟是必要的或非必要的東西再無須外求的。

教育牠本身是必要的這一個前提，前面已經決定了，此地無須再說。教育既然是必要的東西，然則教育為什麼還要強迫呢？這又是教育事象上的一個矛盾的問題。由此，可見教育的「必要」裏面，確如前面所說，最初就包含着「非必要」的東西在內。原來所謂「強迫教育」、「義務教育」乃至近人對於「義務教育」所反動地而稱的所謂「權利教育」等語，都是教育「非必要」的反映。例如蘇俄的文盲撲滅運動，歐美的成人教育運動及中國的民衆教育運動，普及教育運動等等，都是教育必要論的破綻的反證。怎麼這樣說呢？因為這些教育與這些教育運動，在一方面看來，是表示教育的必要；但是在另一方面看來，却是曝露着教育的必要裏面所包含着的「非必要」的東西的緣故。這就是教育的